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中國似乎正逢「千年盛世」，對此中國知識份子有何審思？無論是對中國啟蒙的反思，還是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批評，本刊試圖從多重的視角，展現中國知識份子的盛世憂思。希望這樣的關切能更悠長，更深入，更精闢。

——編者

啟蒙運動與五四運動

陳方正的〈從大逆轉到新思潮〉（《二十一世紀》2009年6月號），進一步論述了十年前舊文所指出，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與二十世紀中國的五四運動作為文化現象的類似性。儘管該文開篇即聲明若干年前余英時對舊文的批評與作者的看法「並無衝突」，但實際上通篇都是對余英時所說的五四運動出於「外來」、啟蒙運動出於「自發」的反駁。作者主要指出五四運動與啟蒙運動在起因、反傳統、正面訴求，以及產生的結果方面都存在着相似性。

該文顯然可以使人從宏觀的視野和世界文明發展史的視角來審視五四運動，但也不免使人質疑找出啟蒙運動與五四

運動眾多的相似性的學術意義。這似乎仍有一種不自覺的歐洲中心論的思維。如果說「五四與法國的啟蒙運動，同樣是英國在科學與政治上的劃時代變革所激發的思想運動」，那麼作者所說的中西文明的比較則難以成立。

在比較研究中，有平行比較和影響研究。平行比較雖也有其價值，但在學術研究中愈來愈不被看重，因為它很容易造成見仁見智。陳方正前後兩篇關於啟蒙運動和五四運動比較的論文，顯然都屬於平行比較。其實，余英時的批評也未擺脫平行比較的思路，因此陳的這篇新作才能夠有更充分的材料予以反駁。人類之歷史現象，大凡總能夠找出相似或相同的。而此類比較，不免有人為地製造問題之嫌。況且，宏大敘事往往造成常識性的梳理大於具體的研究，倒是影響研究在學術研究中愈來愈受到崇尚。所謂影響研究，着意的是兩種研究對象的具體聯繫。以啟蒙運動與五四運動來說，如果探求五四運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怎樣吸收了啟蒙運動的思想資源，或者考察五四人是如何看待啟蒙運動，這樣的影響比較似乎更具學術意義。

不過不難體察，作者把啟蒙運動與五四運動作比較，其現實關懷遠遠大於學術發現，也就是該文的思想性遠遠大於學術性。比如，作者在為文的最後明白地昭示：法國的啟蒙運動緣於盛世中的知識份子的憂思，而當今似同樣逢盛世的中國知識份子，面對五四運動未產生啟蒙思想結晶的局面，自然應該居安思危，致力於新的啟蒙，以實現中國更理想的變革和穩定。

張太原 北京

2009.6.28

啟蒙是不可或缺的假設

在〈重新反思五四以降的中國啟蒙〉（《二十一世紀》2009年6月號）一文中，高全喜列舉了啟蒙遭到來自保守主義、傳統社會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三方面的質疑。作者認為，上述三種路徑的批判雖然具有一定的建設性意義，但並不能認為啟蒙在中國已經就此完結，我們應該做的是探討一種可以吸取以往教訓的新啟蒙，而不是徹底否定它。

啟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1980年代，啟蒙作為一種共識構成了凝聚知識界的重要力量，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保持了啟蒙主義立場。然而進入1990年代以後，知識界內部的裂痕開始漸漸明晰並不斷放大，最後發展成為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啟蒙尚未結束，但啟蒙的共識已然破裂。和以往的許多事物一樣，

啟蒙要麼被虛無化了，要麼被烏托邦化了。

或許問題的癥結在於：不僅我們的啟蒙是不成熟的，甚至我們對於啟蒙的反思也是不成熟的。對於我們時代狀況認識的模糊是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大家不過是在用一種片面性來抵抗另一種片面性，其結果是從一開始就陷入了概念的空洞遊戲之中。甚至在討論的起點處就已經陷入混亂：一方將啟蒙奉若神明，一方將啟蒙全然捨棄。事實上，啟蒙不過是一個假設，一個並非萬能但卻不可或缺的假設。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將問題引入正途。

薛征 上海
2009.6.25

中國自由主義：一種簡單批評？

何包鋼在〈中國自由主義的命運〉（《二十一世紀》2009年6月號）一文中提出了諸多極富挑戰性的論題，有助於我們反思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其前景。誠然，尚有諸多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僅就如下論點做些簡評：

(1) 自由主義只是扮演一種社會批評的角色，而未能對國家建設做出正面的貢獻。自由主義在批判黨政專權的基礎上主張有限政府，難道這不是在着力批評的同時，強調要進行國家建設？更何況，建設性的批評本身就是一種國家建設的重要體現。在關於專權的批

判上，尚有哪種理論能夠超越痛快淋漓的自由主義？在一個良好的政制尚未建立之前，尚有何種途徑比建設性的批判更有建設性？

(2) 自由主義有三個教條。自由主義從來不反對，也不會忽略、而是非常重視政府對自由的調節和保障，但是反對政府對自由的不正當的調節和違法的、所謂的保障。如何才能求取公正的、強有力的國家力量？在當今中國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由憲政原則如何可能與一個強大的國家權力體制相結合？畢竟，這二者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如果不進行根本性的制度變遷，恐怕很難達到這二者之間雙強共治的效果。自由主義愈來愈重視吸收共和主義關於公民美德的養分，強調要進行公民教育、民主啟蒙，而且已經有一些論者身體力行，兌現公民行動。因而簡單說自由主義主張國家中立，不干預個人生活恐怕不甚符合基本事實。

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批評，應該立足於中國自由主義的事實本身來進行。套用作者的話，如此批評，同樣會犯「中國自由主義的幼稚病」，即「一種簡單的批評」。恐怕這既不符合自由主義本身的主張，又不符合自由主義生長的歷史；對於中國自由主義論者來說，更是有失公允。

阮思余 廣州
2009.7.5

再議陳、杜思想的分歧

高力克在〈五四啟蒙的兩種模式——陳獨秀與杜亞泉〉

（《二十一世紀》2009年6月號）一文中，點出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知識份子——陳獨秀與杜亞泉——結合五四時期兩種不同的啟蒙進路展開論述，其中有一論斷是：「陳、杜二氏思想之分歧，源於其知識、性格和經歷的深刻差異。」再往下推導，似乎應該是何種性格影響着陳或者杜，以及此種性格因何而來；而若談到民族精神的剛柔兩性，往下推導，則是不同民族的性格比較（當然這也是該文第五節所談到的內容）。但不同民族性格的比較如何與個人性格的比較結合起來呢？如若僅因陳傾慕法蘭西而杜深諳英吉利，由法蘭西與英吉利民族精神之不同，來說明同為華族之陳、杜二人的不同，似乎有些牽強；而若因陳、杜性格之不同，來說明他們何以傾慕不同的民族國家，那麼起作用的「性格」因素就被神秘化了。

作者進而談到中國的民族精神如何與法蘭西相契合，從而導致「柔性革命」接連不斷，甚至連新文化運動都成為了一種革命。究其原因是長時期的「剛性統治」，再深究長時期「剛性統治」的原因，似乎又只能回到民族精神與性格上來。由此可見，若以「性格」或「精神」來理解思想文化之差異，無論在個人還是民族的層面，都有陷入循環論證的危險。或許思想史的研究，應該超出諸如「性格」、「精神」的層面，清理出思想本身的基本概念，研究其邏輯發展，使思想與思想史能夠達到內在的一致。這就涉及到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思考。

陳鄭雙 長沙
2009.6.27